

关于“现代性”的几个问题——作为一名日本学者共同思考

宇野木 洋

【説明】

以下に掲げた文章は、2009年4月1日、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において大学院生向けに行なった講演内容を、準備原稿と当日の録音に基づいて再現したものである。当時は、清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における在外研究（2008年10月10日～2009年4月4日）中であり、清華大学中文系の教員のみならず、北京大学中文系の旧知の教員とも研究交流を積み重ねていたのだが、私の帰国が近づいたことを知った北京大学中文系弁公室が、新たな研究ネットワーク構築の一環として講演を依頼してきたのだった。このような得がたい機会のお膳立てを下さった清華大学中文系の王中忱・羅鋼教授と北京大学中文系の王風副教授（当日、進行役も務めてくれた）、講演を聴いた上で、討論に加わり鋭く刺激的な意見を表明して下さいた北京大学中文系の高遠東・吳曉東・韓毓海教授と賀桂梅副教授（賀・韓氏は、著書・論文などでお名前は存じ上げていたが、この日が初対面だった）、討論の際に私の拙い中国語運用能力をサポートしてくれた清華大学中文系院生の藤村裕一郎君、そして何よりも、熱心に聴講し多くの質問・意見を寄せてくれた約40名の北京大学中文系の院生・学生の皆さんに、最初に心より感謝の意を表すしかない。

「关于“现代性”的几个问题——作为一名日本学者共同思考」（「近代性」に関する幾つかの問題——日本人研究者として共に考える）と題した講演は、主要な話題としては以下の2点を取り上げた。1つは、現在の中国における文化・思想状況をどう見るか、という問題で、比喩的な表現になるが、文革終結後30年余りの同時代中国における営みは、日本における明治維新から現在に到る営みを凝縮して展開し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り、それ故に、いわば19・20・21世紀の現象が同時に、かつ重層構造的に存在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視点の提示である。こうした視点は、拙考「異文化受容形態としての〈転向〉と〈回心〉——同時代中国における“西方”文学理論受容の一側面」（笥文生・飛田就一編『国際化と異文化理解』法律文化社、1990年1月、所収）以来、幾度か論じてきた内容でもある。だが、今回の場合は、日本と中国は、欧米列強の圧力によって外から「近代化」させられたという点、即ち、「後発型」の「近代」形成が進められたという点では同質性が存在しており、そのことが文化批評領域の研究において共通認識になりつつある今こそ、「近代」ないし「近代性」をめぐる問題群に関して、ともに議論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問題提起に力点を置いたつもりである。

2つ目の話題としては、文革後中国における「近代」ないし「近代性」をめぐる議論の経緯を私なりに整理した上で、そこに見られる中国的特色と考えられる論点を提起した。周知のように、戦後の日本（「日本浪漫派」をめぐる議論などをも視野に入れば、戦前からと言うべきかもしれないが）においては、竹内好・丸山真男を筆頭に、いわゆる「近代論」が旺盛に展開された経験を有しており、日本独自の理論展開の側面もあるとはいえ、「近代」をめぐる豊かな理論的蓄積が存在していると見てよいだろう。そうした日本の状況と比較した場合、中国においては「近代論」が極めて乏し

いと言わねばならず、文化批評領域で「近代性」というタームが登場してきたのも、1990年代中期以降だったという特徴が存在する。また、いわゆる「4つの近代化」を基本政策としてきたこともあってか、「近代化」が極めて楽観的な色彩に満ちており、それ故に、「近代」に対して無条件的に肯定する傾向が強く、例えば、「近代」が本質的に備えている「暴力性」の問題（舌足らずな言い方になってしまうが、統一化・集団化・均質化などに向けた動力と考えている）に対する認識の弱さなども存在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といった問題などを提起したのだった。もちろん、1990年代末期から21世紀に入って以降の幾つかの貴重な理論的営為、日本の「近代論」と「対話」が可能な、それどころか日本の「近代論」に対して新鮮な刺激を与えるような理論的営為も生じていることを確認し、その意義を踏まえた上でのことではあるのだが。

なお、こうした問題群に関しては、今回の在外研究中に構想を練り執筆を進めていた『『啓蒙』をめぐる格闘——建国後六〇年の文学的営為をめぐる覚書』（『季刊中国』第98号、2009年8月）、「問題としての近代から見た『毛鄧』時代——ポスト文革期の文化批評領域をめぐる予備的考察」（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編『建国60周年記念論集』創土社、2009年9月、所収）において、より詳細に論じていることを付記しておく。

最後に一言しておく、すでにお気づきのように、日本語における「近代〔modern〕」「近代性〔modernity〕」（ただし「近代論」のように、modernityの意味でも「近代」を用いることも多い）は、中国語においては「現代」「現代性」となる。同じ漢字を用いても相違が存在し、それ故の「誤読」が双方に生じていたこともなか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ただし、現在、日本・中国ともに、「近代」と資本主義の関係、資本主義と「市場至上主義」ないし「新自由主義」の関係などが問題化される中で、「規制緩和」や「社会主義市場経済」における各種の矛盾が焦点化してきている以上、「近代」ないし「近代性」の問題群をめぐって、共通の「対話」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は明らかだし、また前述したように、率直な「対話」による理論的探究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も確か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こうした私なりの問題関心を、北京大学中文系の院生・学生に、わずかでも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かどうかは不明だが、講演後の討論の場における質問や意見表明が活発だったことは、私としてもうれしい限りだった。

本論考は、本学文学部教授・岡田英樹先生の退職記念号に掲載されることとなる。私が、岡田先生に次ぐ、本学における2人目の中国語専任教員として赴任してから、すでに四半世紀以上の歳月が過ぎ去っていることに気づかされ、改めて驚かされている。私の前を常に歩み続けておられたのが、まさに岡田先生だった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その間、研究面はもとより教育や学内行政関係においても、一貫して指導・援助を与え続けていただいた。岡田先生の学恩に応えきれずにいる自分に忸怩たる思いを抱くしかないのだが、今後、責任を自覚しつつ、少しでも後を継いでいくように努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改めて思わされている。岡田先生との付き合いの歴史を踏まえると、若干、気恥ずかしい気もしないではないのだが、「先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という言葉、最後には素面でお伝えするしかないと考えている。

日本における「満洲」文学研究のパイオニアの1人であり、かつ、現在では、その第一人者と呼ぶにふさわしい研究者として、いつまでもお元気でご活躍下さい。

**** **** **** **** **** ****

关于“现代性”的几个问题——作为一名日本学者共同思考

1. 自我介绍与今天的话题

大家好！

我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宇野木洋，现在作为访问学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进行研究。我的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方面的研究，2、3年前出版过一部著作，题为《抵制·抗衡·探索》，副标题是《文革后中国文学理论领域》。（就是这本书，现在传阅一下，请参考。）

今天能有机会跟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和老师们一起进行交流和讨论，我非常高兴。我首先表示感谢中文系的老师们，尤其是我的老朋友——王风老师，给我这样难得的机会。

请允许我说几句闲话。大家都知道，王风老师吸烟吸得非常厉害（是不是？），其实我也是“烟民”，因此，王风老师在日本进修期间，我第一次跟他谈话，就是一次研讨会的休息时间里，在吸烟处前面。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们一边吸烟，一边谈着鲁迅的问题。可以说我们是“烟友”。我和王风老师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关系：2年半以前，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家丸山升老师逝去的时候，葬礼虽然按照遗言用密葬方式举行，但是我们当然都前往参加，而且我和王风老师一起把故人的灵柩抬上了灵车。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不能不说就是“师兄弟”。我非常感谢这位“烟友”、“师兄弟”——王风老师。

下面开始进入本题。

今天我打算稍微固执地从日本人的立场谈一谈，因为能够导致活跃的讨论。但是我从日本带来的书和材料非常少，所以讲的内容也有可能笼统，请原谅。

今天我想讲的是两个话题。一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对当前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情况的个人的看法。我想说的，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共同性和不同性的问题。还有一个跟第一个话题有关，是关于所谓“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这个词汇，在当前中国文化批评领域里是被关注、被重视的关键词之一。我想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视角，来参加中国学者正在进行的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因此，今天想讲的内容当然以第二个话题为主。

我的汉语水平，看书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听力和口语的方面有较大的问题，因此会给你们添麻烦。如果我有说错的话，很抱歉。那么开始。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2. 对当前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情况的个人看法——第一个问题

[1] 中国文革后的30多年，浓缩地展开了日本明治时期以后的140年左右所经历的过程

第一个话题的中心内容是这样的：对当前中国文化情况的问题，我的看法就是，中国文革后的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浓缩地展开了日本明治时期以后的140年左右所经历的过程。

怎么看最近的中国情况呢？我想首先印象式地谈一谈。我第1次来到中国是1987年，已经过去20

多年了。我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的话，一共有2年半左右（不到2年半，2年4个月左右吧？），所以，在中国去过的地方、参观过的地方比较多，大半是沿海的大城市，但是安徽省的农村一带、西安郊外的农村和重庆郊外的农村等等也去过。去看一看各个地方，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见闻，我以为，当前中国同时出现了日本有过的明治时代、二战后的混乱、高度经济成长、泡沫经济以及高新科技革命、高度信息化的各种现象。

我以为，在有些方面（尤其是农村的一部分吧），中国正在面临着日本明治时期的课题，例如自由民权运动、扫除封建习俗等等。同时，在中国又存在着日本战后混乱时期出现的某种现象，例如价值观念转换时期的混乱和沸腾起来的社会活力等等。另一方面，年经济增长比率持续在近百分之八到十左右的中国，又存在着跟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相类似的问题，例如物价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同时，中国又呈现出了买房热以及股票市场大升温等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发生过的现象。还有，当前中国的高新科技、高度信息化发展快、水平高，有的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和日本。据报道，有手机的人数08年到达了6亿4千万人，就是压倒的世界第一。还有，能上网的人也达到不能想象的庞大的人数。

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前中国所有的这些现象，也就是说，日本的从明治时期到高新科技革命、高度信息化时期的现象，都同时出现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重要的。可以说，发生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等等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差距问题，原因之一，也在于由于浓缩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多层结构。

[2] 日本本身也把西方国家 200 多年的现代化经历的过程浓缩在 140 年的过程里

我的说法也许有些太笼统，我认为，中国文革后的30多年，可以说浓缩地展开了日本明治时期以后的100多年所有经历的过程，也就是现代化过程。（在这里，怎么看中国20世纪前半到文革期间的历史，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放一下，讲第二个话题的时候，我打算再提及一些。）

其实，日本本身也是可以说的，把西方国家的法国大革命以来200多年的现代化经历的过程，浓缩在明治时期以后140年的过程里了。所以，当前日本也存在着明治时期的封建主义残余，比如天皇制度等。就是说，日本和中国从现代化这样的视角来看，都是“后发型”国家，都有在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影响力之下被“现代化”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有共同点。但是，实现“现代化”的时期以及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道路，当然也有不同点。所以，日中学者关于“现代化”问题或者“现代性”问题一起进行讨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话再说回来。

这样的当前中国的社会情况，不能不说反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上，就是我对中国的看法的基本视角。

[3] 刘再复与刘宾雁的发言（1980年代末期）

这样的看法，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比如说，80年代末期，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曾经指出：“这10年（就是文革后10年的意思），社会在急剧变化，西方19世纪到20世纪的文学变化的过程，似乎被浓缩在这十年中重新演进了一遍”（《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此外，1988年也有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先生（很遗憾，他2005年12月去世了），他在美国的讲演中说过：“（现在的）进步应当说是很快的。另一方面，中国却必须完成非常困难的工作。西方15世纪的文艺复兴至20世纪的变革过程（也就是说“现代性”形成过程）和西方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变革过程（也就是说“后现代性”的发生过程），在当前中国同时发生了。现代文化的启蒙思想，最

基础的民主主义、自由和人权等等思想现在开始普及，同时，60年代以后的新思想也开始普及”（《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百姓》1988年第5期）。这两个人的话，尽管思考的范围有所不同，发言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出有和我共同的问题意识。

他们的文章都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表的，也就是说，看得出“启蒙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可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经过20年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发生了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当然的，但是从文化结构、社会结构来看，尤其是从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的角度来看，换句话说，考察“现代性”的问题的时候，这样的看法，就是，由于日本或者西方现代化过程的“浓缩”作用，中国社会、文化形成成为“多层结构”，我觉得现在也有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各种现象（暂且说，“前现代”现象、“现代”现象和“后现代”现象），这样的各种现象只能以“多层化”的形态存在和出现，就是中国的特征。（刚才说过，日本也存在着以天皇制度代表的那样的“前现代”现象，但是“多层化”的程度比中国还少，构成一定的均质性，同一性社会和文化，因为是日本有了140年的时间，可是中国只有30多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冲进了全球化时代。因为如此，西方以及日本出现的种种状况，尽管出现的性态有所不同，毫无疑问还是出现在当前中国。

[4] 日本和中国对于共同的课题（“现代性”等），完全可以并且有必要进行共同的讨论

日本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时期以后（就是明治时期以后）日本所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采取了对抗态度和批判态度。不怕误解地说，我们日本学者现在特别有必要与其站在同一地平上，来思考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在日本，以前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与日本完全不同，这种倾向比较严重。（我知道，中国的情况确实复杂。）但是，我以为并不是这样。当然不同的地方和部分也很多（我也已经说过了），可是现在重要的是，对于共同的课题，完全可以，并且有必要进行共同的讨论。从这种角度来看，我觉得，日本和中国应该一起进行研究的共同课题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文化方面上，文化批评领域上。

这样的课题之一，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关于“现代性”的问题。

那么，下面谈第二个问题。

3. 我怎样看中国文化批评理论领域的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我怎样看中国文化批评理论领域的关于“现代性”的讨论。

首先，回顾和追踪整理一下文革后，即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现代性”的理解动向。

[1] 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讨论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批评领域的讨论，我们现在都认识到，总的来说，是“启蒙主义”的色彩非常强，因此，对于“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看法，还有对于“现代派”和“现代主义”的看法，也有简单化的理解，甚至有“误读”。

但是，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现代性”这个词非常非常少见。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依据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对1979年到2005年前半期发表的中国学术论文进行的调查，称“从1979年到1987

年的整整9年中，中国人文社科的学术论文中没有发现过一篇以‘现代性’为题目的文章，1988年出现了2篇，但很快又消失了，直到1993年以后才连续出现了‘现代性’论题。真正开始对‘现代性’概念的探求大概得从1993、94年的一些论文算起”。附带说一下，1993年有4篇，94年有16篇，然后继续剧增，1999年是107篇，2002年是213篇，04年达到381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批评领域，对跟“现代”或“现代化”有关的论题没有感兴趣（那是当然的，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大力宣扬“现代化”这样的口号和目标，人们对“现代”或者“现代化”的关心非常高，而是意味着，长期没有以“现代性”这样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他们感兴趣的“现代”或者“现代化”。就是说，不使用“现代性”概念而对“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派”等等的问题进行考察，出生了有点混乱，是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包括“现代化”和“现代派”，还有“启蒙主义”等等的“现代性”这样的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再回到先前的话题。

我刚刚说过，80年代对“现代性”的理解甚至有“误读”，那么，什么是“误读”？大家都已经知道，“现代性”的内涵非常复杂，“现代性”包括的内涵，除了以“现代化”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倾向，还有一种反思和批评“启蒙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西方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的思想倾向（当然包含着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粗略地讲，对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换句话说，以人中心观点、科学信奉、理性信仰、进步史观等等为内容的“启蒙主义”，毕竟导致了头一次世界规模的大战（即世界规模的破坏和杀人），对于这些现象，就是加以反思的思想和思潮。可以说，西方20年代以后的所谓“现代派”或“现代主义”，都包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重新认识、怀疑、批评、批判等的文学思想潮流。

但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领域，把“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简单化，而视为无条件地肯定“现代化”的文学思潮。比如说，徐敬亚《崛起的诗群——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是拥护所谓“朦胧诗”的文章，强调现代诗歌的特征有，形式是“现代主义”而内容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自我表现”，在这一点上，这种主张不能不说内容是“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而形式是“反对启蒙主义的现代性”。

到了80年代中期，文化批评领域里，围绕文学“新方法论”（就是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热烈的的讨论，但是，上述的“误读”基本上没有解决。比如说，80年代中期被关注的话题之一，是刘再复提出的“文学的主体性”，这篇文章的主张，虽然援引西方理论，但是强调“文学是人学”、“主体性是人的无限的可能性”这样的观念。到了80年代后期，也出现了被称为“文化热”的现象，对“现代化”的简单化理解也开始进行反思，可是总的来看，难免“启蒙主义”的倾向。

但是，80年代文化批评领域出现这样的倾向，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否定文革路线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一个口号力主“现代化”，因此，无条件地发生肯定“现代化”、“现代派”、“现代主义”等和“现代”这个词汇有关的概念，是当然的。还有，文革确实就有完全否定“人性”、科学、理性的这样侧面，而且存在着抗拒西方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理论探索的一个侧面，所以，文革后的文化批评领域带来了启蒙主义色彩，是自然的、当然的。而且不能不说，因此，80年代末期能出现了那种要求“民主化”的大运动。

[2]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性”讨论

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批评领域的情况怎么样呢？

90年代前期的文化批评领域里最重要的讨论，不能不说就是“人文精神”论争。在此省略详细的介

绍，围绕“人文精神”的讨论，从“现代性”话语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有一部分也能发现，对80年代“启蒙主义”倾向开始反思，但是基本上处于“启蒙主义”倾向的延长线上，其实，把“人文精神”这一词汇作为出发点开始讨论，带有了“启蒙主义”的色彩，我觉得是必然的。

还有，所谓“后学”论争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讨论之一。但是，从研究“现代性”话语的角度来看，不能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为议论的出发点或者前提，在于认识“现代性”已经终结了，就是说，明确评判“现代性”终结的上面。因为“后现代”或者“后现代主义”作为议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当然的（“后学”、“后现代”的“后”，当然就是“什么什么之后”的意思吧）。所以，“后学”论争里，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性的重新研究，是不能不被回避了。没有对“现代性”的内涵复杂性的扎实的研究，就宣布“现代性”的终结，本来是奇妙的事，由于这种情况也是原因之一，“后学”的主张客观上来看，终于带来了保守倾向（就是跟强调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无意中走上同一条路），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在中国文化批评领域里，第一次对“现代性”的复杂性加以研究，而且提出了作为问题的“现代性”这样的视角，是哪位写的什么文章呢？我认为，这就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汪晖老师写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这篇文章，不幸被卷进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被视为是代表“新左派”的一篇，本来可是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探索的，而且提出了极其深刻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视角的。但是这篇文章，内容比较复杂和广泛，因此，我们首先看看汪晖老师同一时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叫《我们如何成“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汪晖老师在这篇文章里写道：“许多西方学者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都指出，现代性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其中充满了矛盾。因此，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时期，被指为现代性的质素是极为不同以至矛盾的。对于18世纪（以来的）启蒙主义而言，现代性如同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方案’（project），这个方案包括‘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追随其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艺术’等方面，而最重要的特征是‘主体的自由’”。

于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汪晖老师强调：“在这些以‘主体的自由’为特征的现代方案内部，充满了紧张和矛盾，这种矛盾尤其体现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世俗化过程与文学艺术对这个过程的尖锐批判之间。如果说前者体现为对于进不的时间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技术的信心，对于市场和行政体制的信任，对于理性力量和主体的自由的崇拜等等，那么，现代主义的美学现代性却只有激烈的反资本主义世俗化的倾向。”“现代性问题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的发生而发生的，也是伴随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传播和扩散（在其初期采用殖民主义的可耻形式）而进入中国人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视野的。因此，一方面现代性是一种观念，一种历史叙事；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历史叙事并非没有其物质基础。我需要强调的是，说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并不等于接受现代性的历史叙事，相反，我们需要观察的恰恰是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如何进入历史——包括文学的历史、成为文学的主体、规划文学的形式、等等——的过程。”

我们清楚地看到汪晖老师对“现代性”的看法的轮廓。我也基本上同意汪晖老师对“现代性”的看法，就是“现代性”本来包含着复杂的矛盾。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汪晖老师把“现代性”孕育的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世俗化过程”和对这个过程“文学艺术的尖锐的批判”的矛盾。我看在这里有点简单化，关于这一点，我想以后再详细讲一下。

关于汪晖老师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我在这里不加以说明，因为在文化批评领域里面讨论得非常多。我只想指出，汪晖老师强调应该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本身作为“现代

性”的问题加以对象化，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汪晖老师也通过这样的思考提出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种研究视角，这意味着提出了有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历史而生成的“现代化”社会的问题，也意味着提出了有没有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现代化”历史过程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实，日本的竹内好（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也提出过“反现代的现代”那样的问题视角（日语叫“反近代的近代”）。所以，汪晖老师提出的问题意味着，跟竹内好以来日本学者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积累，才能开始一起进行讨论和对话。（我讲第一个话题的时候说过，日本也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由于西方国家的压力而“被现代化”的国家，因此，不能不思考西方“现代性”和日本“现代化”过程的问题，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有很多的积累。）我认为，出现了汪晖老师的文章，中国文化批评领域里才能取得把“现代性”从根本上加以探索的问题视角。

顺便说一句，我曾经问过汪晖老师：“你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看法，有没有竹内好‘反现代的现代’的影响？”他回答说：“没有”。但是我无法相信这个回答，觉得可能是无意识地受竹内好思想的影响。

[3] 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现代性”探索

那么，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中国文化批评领域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情况是怎样的呢？

依据南帆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 99 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年 9 月）里的“现代性”条目（刘小新执笔），称“‘现代性’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炙手可热的语词之一，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也争先恐后地使用这一流行术语”。但因为如此，还称也可见如下的情况：“‘现代性’概念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想空间，在它的吸引下，20 世纪中国文学各个层面的问题都聚集在一起，得到一种整体的观照；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过度使用和时尚化，也将掏空这一概念的内涵。许多时候，它或许只起着万金油式的消除皮肤瘙痒的作用。”

的确，考察最近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我觉得有点混乱，有的部分也发生了“现代性”的泡沫现象。我以为，现在必要的课题，不是把“现代性”这个概念变成“万金油”（即不是在现代文学史里发现被简单化的“现代性”），而是通过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性加以更深刻的探索，从“现代性”这一角度重新描写新的全面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我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还是要特意提出。

这一点上来看，尤其是把“现代性”问题拿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问题里研究时，有几篇不能忘掉的重要论文，就是你们北大中文系高远东老师写的《未完成的现代性》（《鲁迅研究月刊》1995 年第 6·7·8 期）、《“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研究月刊》2000 年第 7 期），还有吴晓东老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文艺理论研究》1999 年第 1 期）等等。我觉得，这些文章虽然是 90 年代末期写的，但是好像预见到了现在的研究课题。我今天不好意思，略去详细的解释，因为你们都已经看过这些文章（是不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高远东老师的《未完成的现代性》一文，重新分析“启蒙”概念具备的重要意义，而且强调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还未有效地建立，“启蒙”的使命也尚未完成，我以为就是有意义的探索；还有，通过周密的调查指出，中国文献中“现代性”一词最早出现于 1918 年发表的周作人的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新青年》第 4 卷第 1 期），这也是重要的贡献。《“现代”如何“拿来”》一文，是围绕“现代性”问题，跟竹内好的思想要进行对话的。我刚才说过，跟日本“现代性”研究的积累成果开始对话是重要的，这篇就是这种尝试的最早期文章之一。

还有，对吴晓东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一文来说，借用本雅明等的西方理

论考察“现代性”复杂性的同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存在的独特审美感，如“寓言性”、“挽歌性”、“失乐园感”、“形式感”等，从“现代性”和审美感的关系这样的视角来加以分析，要确定沈从文、张爱玲、废名、师陀等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主义上的位置，有很大的意义，不能不说，就是走向重新描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第一步。

我希望，包括你们年轻研究者内在的中国学者，从“现代性”这一角度重新描述新的全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最终面对的，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独特的“现代性”问题。

4. “现代性”讨论中不可缺少的两个观点

最后，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对“现代性”进行讨论的时候不可缺少的，而在当前中国文化批评领域里有点缺少的视点。在我看来有两个。

第一：我以为，中国文化批评领域的讨论里，“现代性”本来有两个（或者有两种），一个是“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还有一个是对“现代性”的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现代性”，这样的看法比较强。比如说，“启蒙现代性 / 文化现代性”（周宪）、“世俗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现代性） / 审美现代性（现代主义先锋美学的现代性）”（汪晖）、“前期现代性 / 后期现代性”（于可训）等等。

但是，“现代性”有两个（或两种），这样二项对立的认识，是没有问题吗？还有，把对“现代性”的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现代性”，叫做“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等，是没有问题吗？我觉得，有可能引起误会，对“现代性”的反思只有特定的方面上出现的现象，只有文化和审美方面上的现象。

我以为，所谓“现代化”、“现代性”的方案，从它自觉地启动以来，内包着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要素（动力）。（方案本来是这样的意思吧？）所以，“现代化”、“现代性”面临矛盾和危机的时候，能产出超越“现代化”、“现代性”的矛盾的思想和运动等等，我以为，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说，社会主义运动吧！）也是这样的动向之一。“现代性”不是有两个（两种），而是本来存在着“两面性”，这是我的看法。

第二：我以为，“现代性”本来具有“两义性”（请注意，不是刚才说的“两面性”），换句话说，“现代化”或“现代性”可以说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等均质化（人类的历史来看，就是进步），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不能不说，把人本来具有的多样性消灭在均质性里，消去了人的个性。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讨论里，我看缺乏这种观点，就是说，没有看清“现代性”本来具备一种“暴力性”的侧面。

“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暴力性”的侧面，就表现为把社会成员均质化、统一化、集体化，“现代性”本来具有这样的动力。比如说，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说，实现“现代化”或“现代性”基础阶段的国家），这样的现代民族国家首先都设立学校而普及教育，由于教育内容（义务教育）追求国家的统一化和同一化，培养“国民”。普及教育是重要的、有意义的，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可能性（或者存在着一种侧面），起到基本上的世界观和思想的统一化的作用。对极端的现象来说，由于尽力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会有排除异端者和异端思想。二战以前的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或军国主义教育就是这样，把异端者视为“非国民”而否定。

怎么认识文革，确是非常难的问题，中国的一般的看法是，封建的要素（没有实现民主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即“前现代性”）带来了文革。不过也能把文革看做就是典型的“现代性”产物，因

为在“前现代”时期，检查每个成员的思想态度不会存在，这是排除异端者（或者异端思想）的“现代性”的“暴力性”侧面的表现。“现代性”本来具备“两义性”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是不能缺乏的视点。

有一位日本学者，是对竹内好思想的学识渊博的人，他常常说，20世纪发生了四大虐杀（屠杀）事件，是日本的南京屠杀、德国纳粹党的犹太人屠杀、苏联的由斯大林进行的肃清和中国的文革，这四大虐杀事件为什么发生在“现代化”实现或正在实现的20世纪里，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也以为，文革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以上，我想强调的是，“现代性”这个概念非常非常复杂。可是，只要引进这个概念，就能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思想空间，今后也一起进行研究和讨论。

今天讲到这里。我冒昧地执着于日本人的立场，谈了不成熟的见解，如果有失礼之处，也请原谅。谢谢大家！

（本学法学部教授）